

##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张越

[摘要]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史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实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辨》 “古史辨派”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2-0111-05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首次公开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也由此引发了引人注目的古史论战。1926年,汇集了讨论古史的文章与信件的《古史辨》第1册由朴社出版,“古史辨派”因此而得名。80年来,围绕着“层累”说、“古史辨派”、“疑古”与“信古”、“疑古”与“释古”、“疑古”与“走出疑古”等问题,在学术界展开了一次次的讨论高潮,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相关学说涉及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问题,古史重建、古籍辨伪、经史关系、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之于古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等重大学术问题均与之密切相关。随着对这些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一些关于疑古学说的基本问题实有必要得到明确和澄清,庶几可有助于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本文试图辨明《古史辨》和“古史辨派”之意,以求教于方家。

### 一、《古史辨》第1册的出版与“古史辨”的涵义

顾颉刚在为《古史辨》出版所写的《自序》(1926年)中对《古史辨》第1册的出版经过作了交待。古史辩论展开后,朴社同人希望能将论辩文字编辑成书,因为时间关系,顾颉刚一直未能动手来做这个工作。直到1925年夏天,“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辩论(原文如此——引者)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纂,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sup>[1](P1)</sup>

1979年3至4月,顾颉刚应邀为《中国哲学》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sup>[2](P306)</sup>一文,文中也提及《古史辨》第1册的编写出版情况:“在上海的时候,我同沈雁冰、胡愈之、周予同、叶圣陶、王

作者简介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5)。

伯祥、郑振铎、俞平伯等人晚上常常在郑振铎主办的‘文学研究所’所租的一所房子里开会或闲谈，算作一个俱乐部。自从我加入之后，也讨论些古史和民歌问题。有一次由郑振铎发言，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办一个书社的好。大家听了他的话，都说很好，于是办了朴社。”“《古史辨》第一册，是我与胡适、钱玄同、刘澹黎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以‘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在这一册中，许多问题的论证，现在看来是不够坚强的，但主要的见解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我写了一篇六万字（原有十万字，发表时去掉了‘孟姜女’的一部分）的《自序》，说明了我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这些见解的原因。这篇序实足写了两个月，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最畅的文章之一。海阔天空地把我心中要说的话都说出了……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想不到这一册销路好极了，一年里竟重印了二十版。”<sup>[3] (P20-21)</sup>

可见，《古史辨》的出书，直接缘于顾颉刚发表“层累”说而引发的古史讨论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又因为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朴社，便有意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出版，及至见到“上海某书肆”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而该书“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终于促成顾颉刚“立即编印”，再加上一篇6万字的长序，《古史辨》第1册就这样于1926年6月11日问世了。当然，这只是《古史辨》第1册出版的简单过程，因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是导致《古史辨》第1册出版的真正缘由。《古史辨》第1册出版之前，就已经有人根据古史讨论编成了《古史讨论集》，说明不仅顾颉刚及朴社中人关注及此，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及相关的讨论已经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的学术现象。

《古史辨》第1册由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沈尹默题写书名。书名应该是顾颉刚亲自定下来的。钱玄同认为书名不合适，顾颉刚则坚持未改，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先生谓《古史辨》之名不适用，但我所以不除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例如与建功辨论（原文如此——引者）《诗经》与歌谣之文，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之考定即可辅助古文之考订，故仍不妨收入。”<sup>[2] (P113-114)</sup>顾颉刚执意以“古史辨”命名，说明其“目光皆在于古史”的深刻用意，反映了当时经史转换、史学独立、学术求真、解放思想的学术与社会趋向，这在作为史学家的顾颉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决定。

需要讨论的是“古史辨”之“辨”字的含义。“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的《自序》中使用了“辩论”、“辨伪”、“辨明”、“辨证”等词汇，可知当时所用的“辨”字包含了今天人们使用的“辨”和“辩”字的双重含义。目前尚无资料确定顾颉刚在定书名为《古史辨》时，取的是“辨”的辨别之意还是辩论之意，从《自序》的行文来看，似乎两种含义都有使用。如在《自序》的结尾处他写道：“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sup>[1] (P103)</sup>即指讨论与研究的目的为辨别古史真伪，“辨”就是辨别之意；他又写道：“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这在字面上理解，当指该书内容是以讨论为主的，其意则倾向于“辩”。进一步来看，讨论的目的仍然是在辨别古史真伪，从“辩”依然落实到“辨”。《古史辨》在形式上是汇集了研究、讨论和辩论古史的文章和信函，最初以此种形式展示于人的“古史辨”形象是基于顾颉刚疑古学说提出前后所引发的相当规模的争论这一客观现象所决定的。为了充分反映“辨伪”过程中提出、讨论、研究问题的全貌，引发人们更加努力去辨别和探讨古史真伪，顾颉刚选择了《古史辨》这样的编纂方式。为了回应当时人们因此种著述形式而无法获得结论的“烦闷”，顾颉刚甚至解释说：“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但是他随之强调这“是汇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目的是“我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肚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sup>[4] (P3)</sup>《古史辨》汇集个人信札发表，也是顾颉刚有意为之，他说：“这样才可使我们提出的

1925年夏，曹聚仁将讨论古史的文章编为《古史讨论集》一书，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问题成为世间公有的问题，付诸学者共同的解决。从前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们正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把金针度与人，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sup>[4] (P4)</sup>

在内容编排上，《古史辨》第1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在《读书杂志》进行辩论前的文字，其中的论学信件“实开予等治史之门”；中编是在《读书杂志》发表的讨论文章，这些文章虽未得出结果，但是却建立了“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下编是在《读书杂志》辩论后的文字。从编纂《古史辨》的最终意图和内容编排来看，立意均在顾颉刚所强调的他的古史研究的“立足点”是“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他“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sup>[1] (P65)</sup> 则书名《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的研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绝非是如先前他人所编的《古史讨论集》那样一本辩论文集般简单。“辨”与“辩”对于《古史辨》本身及其学术内涵来说，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如果说当初使用“辨”的时候，因“辨”、“辩”通假而在含义上稍有模糊之感，那么今天我们不应对此再有歧义。

从《古史辨》第1册出版后的实际影响看，其“古史辨”的辨别古史及古书真伪的涵义为人们所接受。周予同在《古史辨》出版的一个月后，发表了《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论及该书“所表现的方法”和研究“目的”，文中将该书上编总结为“辨伪的工作”，中编总结为“考古史的真相”，中下两编及序文谈及的“是想用研究故事转变的方式来研究古史的变化”。<sup>[5] (P323-329)</sup> 刘起舒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颉刚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sup>[6] (P6)</sup> 从《古史辨》第1册出版至今，人们从中所读出的表现方法、研究目的、治学成就，说明《古史辨》中无论是顾颉刚与人讨论古史的文章与书信还是长达数万言的“序”，都以区别于一般“专著”的形式阐发并展示了顾颉刚考辨古史的路径、观点和学术追求。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所感谢的那样：“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挞黎）、胡董人、柳翼谋（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肤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满足了”。<sup>[1] (P3)</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人的辩诘是顾颉刚怀疑并探究古史真伪的驱动力之一。真实反映讨论古史时的诸家所言，向世人全面展示个人与他人考辨古史的观点和进展，不仅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更反映了顾颉刚本人的学术胸襟和所把握的学术规范。

## 二、“古史辨派”释义

《古史辨》出版的后果之一，便是有了“古史辨派”这一称谓的出现。从1930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第2册至第7册的《古史辨》陆续出版。刘起舒说：“于是在中国史学界里，出现了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到1941年出到《古史辨》第七册止，一个使中国古史研究从传统的霾雾中解放出来，因而使古史资料的批判利用起了根本性变化的学派登上中国学坛，显示了它对历史学术领域所起的深刻影响。”<sup>[7] (P131)</sup>

说起“古史辨派”，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诸派中的“疑古派”。笔者认为，不论是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sup>[8] (P33)</sup> 还是周予同的泥古、疑古、考古、释古说，<sup>[9] (P422)</sup> 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才是促使他们产生上述观点的主要诱因。正是由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所产生的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对古史研究的重视，才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史学派别的划分。信古派是以不同意“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态度为特征的，释古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了“古史辨派”对古史提出了怀疑之后才更加明确要对古史进行“考”、“释”，以建立可信的中国古史系统。已有学者指出：“从方法论史料学层面看，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毋宁谓之释古派，或经正名为辨古派。此始是顾先

---

从掌握的材料上看，较早使用“古史辨派”一词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李季等人。

生自己的意思，故其书名曰《古史辨》。<sup>[10]</sup>我们知道，顾颉刚本人对将疑古辨伪的工作相对于“信古派”和“释古派”而称之为“疑古派”的观点，并不同意。1951年顾颉刚撰写的“自传”中，对于“信古”、“疑古”、“释古”诸派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sup>[11]</sup>晚年的顾颉刚在回顾如何编写《古史辨》的时候，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sup>[3] (P28)</sup>说明他对“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他所不能同意的，是作为“疑古派”的划分与所谓“信古”和“释古”并列，这样便意味着“疑古派”仅仅是怀疑和为疑而疑，而事实是“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派”与“古史辨派”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却是有着直接关联的。顾洪说：《古史辨》是“旨在用科学的方法考辨古代史料和古史传说、推翻封建古史体系的学派——古史辨派的由来。”<sup>[12] (P579)</sup>王学典、孙延杰说：“也正是在这本书（指《古史辨》——引者）的推动下，一些学者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如罗根泽、刘节、童书业、杨宽等人，甚至包括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他们很快便成为其中的骨干。一个以疑古辨伪为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基本理论的‘古史辨派’就这样登上了中国史坛。”<sup>[13] (P21)</sup>由于《古史辨》的出版而聚集了学术志趣相同的人成为“古史辨派”，然而仔细归拢“派”中之人，却又十分模糊。各类文章被收录到《古史辨》中的作者或在《古史辨》中参与过讨论的人数众多，如钱玄同、胡适、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李玄伯、傅斯年、张荫麟、刘复、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郭少虞、陆懋德、曹养吾、钱穆、容肇祖、郑振铎、俞平伯、周作人、董作宾、钟敬文、朱自清、罗根泽、梁启超、刘盼遂、游国恩、余嘉锡、张尔田、朱希祖、唐兰、马叙伦、蔡元培、高亨、吕思勉、刘节、郭沫若、范文澜、童书业、方国瑜、杨宽、杨向奎、翁独健、蒙文通、齐思和、陈梦家、吴其昌等人，涵盖了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古典文学等学科领域。去掉那些不同意顾颉刚疑古学说并与他进行论辩的人（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再去掉那些观点不十分明确或前后发生变化的人（如王国维、胡适等），在余下的人们中，可以划归“古史辨派”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杨向奎在1981年发表的《论“古史辨派”》<sup>[14]</sup>一文，所论“古史辨派”人等，除了顾颉刚外，还有就是童书业，仅此二人而已。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其实是一个相当笼统的称呼。“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研究讨论往往有一个中心问题，这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谁规定的。学派成员散居国内外，没有什么联系……与清代经今古文学派，也不是一样。它不是维护圣经贤传，而是追求可信的古史。”<sup>[15]</sup>

顾颉刚曾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的结尾写道：“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目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进展的诤友。”<sup>[1] (P103)</sup>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信念决定了“古史辨派”的特点：少有学派之门户，多以研究为目标。“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以疑古辨伪为主的研究目的即包含有探究真实古史的努力。假如对以往古史系统不存在疑问，那么也就不会有研究古史的动力。辨伪史和求真史这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顾颉刚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笼统说来，他的新式古史学重心，在凭借古史传说的清理和研究，以‘信信疑疑’，以求去伪见真。”<sup>[16] (P182)</sup>

经过80多年来围绕古史辨伪的反复研究和不断论争，“古史辨派”的称谓表面上给了人们一种以“疑古”为主的印象，而实际上所谓的“古史辨派”学人却少有为疑古而疑古的；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



去探究古史真相的人很多, 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 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顾颉刚无意建立一个有“许多盲目的信徒”的“古史辨派”, 他本人没有使用过“古史辨派”四个字。被认为是“古史辨派”成员中的学人, 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 多倾向于基本接受“层累说”理论或大致赞同使用疑古辨伪方法, 然而其各自的学术观点也不乏相异相争之处, 确实表现为“敢用自力去进展”, 而非无条件地维护什么信条与观念。在今天看来, “古史辨派”仅是一个“笼统”的称谓, “古史辨派”作为五四时期所出现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成就的学术思潮确然存在, 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 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 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自序 [A]. 古史辨 (第 1 册)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 顾潮. 顾颉刚年谱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3]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A]. 古史辨 (第 1 册)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 顾颉刚. 自序 [A]. 古史辨 (第 3 册)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5] 周予同. 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A]. 古史辨 (第 2 册)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6] 刘起釞. 古史续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7] 刘起釞. 顾颉刚先生学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冯友兰.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A]. 中国哲学史补 [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9] 周予同. 纬讖中的“皇”与“帝” [A].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罗义俊. 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 [J]. 史林, 1993, (4).
- [11] 顾颉刚. 我的治学计划 [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 (2).
- [12] 顾洪. 顾颉刚 [A]. 学术大师治学录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3] 王学典、孙延杰.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 [14] 杨向奎. 论“古史辨派” [A]. 中华学术论文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5] 周春元. 论古史辨派的史学 [J]. 史学史研究, 1984, (1).
- [16]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郭秀文